

## 可持续发展与系统动力学

# 北京社科院第31期公共政策学术沙龙举行

■陆小成 北京社科院

2015年4月8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第31期公共政策学术沙龙在院六层会议室举行。本次沙龙的主题是:可持续发展与系统动力学。由北京社科院青年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市情调查研究中心、北京世界城市研究基地共同举办,北京市市情中心副教授何仁伟博士后做主题报告,北京市市情中心副主任陆小成博士主持。来自北京市社科院社会学所、北京市市情中心、北京世界城市研究基地等研究人员参加了本次沙龙活动,北京市市情中心主任、北京世界城市研究基地秘书长唐鑫作为学术顾问对本次沙龙进行点评和指导。

北京市市情中心何仁伟博士后作主题报告。他认为,在未来若干年,中国可持续发展存在六大问题或挑战:(1)人口压力;(2)能源和自然资源的超常规利用问题;(3)必须实现生态环境的“倒U型曲线”右侧逆转;(4)实施城市化战略的挑战;(5)加快区域间发展的平衡并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所面临的问题;(6)国家信息化急速推进和科技竞争能力培养所面临的挑战。系统动力学是基于系统论,吸收控制论、控制论、信息论、协

制就非常重要。北京市市情中心赵雅萍博士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大课题。赵博士说,正如教授所言,其测量和评估涉及到经济、社会、环境、人口等多个维度;UNDP曾经用人类发展指数来评估成员国的可持续发展水平,但这个指标也仅包含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三个方面。在选取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指标方面,难免会出现挂一漏万的情况;何教授报告中的系统动力学方法不失为测量可持续发展水平的一个好的尝试。

北京市市情中心陆小成博士认为,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一个重大的系统工程,需要采用系统动力学的方法研究可持续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及三中、四中全会将生态文明上升到五位一体的高度,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全面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实现这些战略目标,需要从系统动力学的角度深入思考生态文明时代的可持续发展核心问题。当前经济不生态、政治不重要、文化不支撑、社会不参与、环境不监管等系统性诟病,严重制约了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不进行系统治理和全面改革,可持续发展只能是部分地方政府的一个政治口号而已,也只能头痛医

头脚痛医脚,难以找到病根,难以彻底根治。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需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等多个领域进行系统思考、协同治理、全面改革。北京市市情中心主任、北京世界城市研究基地秘书长唐鑫点评时指出,何仁伟副教授从系统动力学的角度对可持续发展进行阐释,为我们研究相关问题提供了参考。他的报告有高度、有新意,其中的模型很规范、精准、实用,我们中心将来研究相关问题可以借鉴它。各位博士就这个报告分别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真见智识,在总体肯定的同时指出了不足,真正体现了学术民主。我个人认为这个报告的理论基础是“老三论”,即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用它们来研究可持续发展这个系统性大问题是恰当的;可能由于时间关系,这方面的论证还未能展开,可以展开些。另外,我希望酌情运用“新三论”,即系统科学领域的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研究可持续发展,或许能获得新的成果。总之,学科体系创新、研究方法创新直到学术观点创新,需要学科交叉研究,敢于并善于运用新思想、新理论,以培养我们中心严谨求实的学风和开拓创新的精神。

## 美国对中国知识产权风险发出警告

美国商务部部长佩妮·普里茨克警告称,尽管中国努力让投资者相信他们的技术是安全的,但中国薄弱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选择性执法妨碍了外国对华投资。她表示,尽管中国打造创新型经济的计划意味着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意愿是真诚的,但“真正的对话不仅需要体现在法律条文上,还要体现在法院体系和对这些规则的广泛一致的运用上。”

知识产权盗用一直是长期困扰在华跨国企业的问题。最近几年,中国政府已经采取措施试图安抚投资者,但批评人士表示,违反规则的行为仍很猖獗。但普里茨克表示,对于能否在中国司法体系中得到平等对待存疑,是对外企的一道障碍,它们不想冒险将最好的技术投放到中国。

这也是中国气候变化谈判人员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在去年的巴黎气候变化峰会上,富裕国家的承诺之一就是要将领先的技术转让给发展中国家,而中国目前正推动美国通用电气(GE)等企业将领先技术转让给中国。普里茨克建议小公司从已在华设立业务的企业那里寻求建议,但那些在华企业的一般经验不可能说服它们。

大型跨国企业已习惯于首先出售在海外生产的设备,然后在中国与一家中资厂商合作加紧生产,最终会把技术专利转让给中国合作伙伴。只要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为外资公司创造了新市场,它们可以开发并在中国市场销售下一代产品,这一模式就一直管用。

但有些公司打破了这一模式。去年,英国石化企业英力士(Ineos)对旗下合资企业的中国伙伴、中国最大炼油企业中石化提起了诉讼。英力士表示,中石化抄袭了其在一家石化联合企业使用的工艺,却并未支付专利许可费。该案仍未结案。

英力士把争议公诸于世的作法非同寻常。苹果和三星产品的微型麦克风美国供应商 Knowles 的作法更为典型。因为山东一家法院拒绝让该公司的律师参加庭审,该公司起诉一家中国竞争对手的民事诉讼案以及一系列反诉的才得以曝光。

“跨国公司倾向于派出‘现场团队去应对中国体制’。”知识产权执行集团劳思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鲁克·明福特说,“对于资源掌控有限的中型投资者而言,我们发现要让他们相信机遇大于风险,值得去做,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在华盛顿方面围绕非法侵入和破坏网络安全的行为展开辩论之际,但在华运营的公司已意识到,必须更加当心本公司员工以及合资企业的合作方。

(FT 中文网)

### 外眼看中国

## 4月中国企业信心继续下滑

据考察中国企业信心的一项最新调查,在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持悲观态度的企业数量超过了持乐观态度的企业。

MNI 中国商业指数 (MNI China Business Indicator) 连续第4个月下滑,从3

月的52.2降至4月的48.8,数值为50代表乐观企业数量较多。

MNI 是德意志交易所集团(Deutsche Börse Group) 下属公司, MNI 调查数据来自在沪市和深市上市的200家企业。

中国央行(People's Bank of China)最近推出刺激举措,因通缩压力,以及劳动力和监管成本的日益上升继续令企业承压。

(FT 中文网)

## “一人多户”:中国券商的历史机遇

新的“一人多户”制度,看似微不足道,但会促进投资者的需求得到更好的满足,一些新的需求将被挖掘,券商的综合金融服务将呈现百花齐放。投资将成为一个全民的生意,而不是一种起起伏伏时断时续的投机。

■冯川 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讲师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4月12日发布通知,自4月13日起全面放开A股市场执行多年的“一人一户”限制,投资者可以通过统一的入口“一码通”在至多20个证券公司开立20个证券账户。“一码通”账户涵盖了A股账户、B股账户、封闭式基金账户、开放式基金账户、新三板账户和根据业务需要设立的其他证券账户。次日,上证综指站上4100点。上百只股票涨停,B股几乎全部涨停,同时带动港股大涨。

其实“一人多户”的政策并不算是非常重大的变革,投资者以前也是可以更换开户券商的,只是手续繁琐一点。不少人认为,该政策主要影响的是券商的业绩,尤其是地方性的小券商。这将导致佣金大战,从而压迫小券商的生存空间,对更大、产品更丰富的券商而言可能反而是好事。

这无疑是有道理的。证券账户开放后,投资者不用繁琐的手续就可以挑选券商,将加剧券商间的竞争。首先是佣金价格的



的竞争,那些佣金已经降低到万分之三甚至更低的券商可能会吸引更多投资者,从而拉低整体佣金水平。尽管如此,随着股市火爆,券商经纪业务也是大赚其钱。不过,有观点认为,“一人多户”后券商经纪业务将面临激烈竞争,券商想仅靠通道赚钱会越来越难,而更多的券商可能会以经纪业务作为基础,以低佣金吸引更多投资者,继而通过向他们提供更多产品、更多服务获得利润增长。

其实,对于很多资金规模大的客户,不少券商会给予他们比一般散户低的佣金比例,而所谓更多产品、更多服务,其实不少券商也早已行动起来。所以,佣金比例不一定是“一人多户”实施后的关键词,毕竟很多投资者是追逐着百分之几十甚至百分之几的收益,对万分之几的成本差异并不关心。

在“大投行”或者说“综合金融”的旗帜下,多数券商其实已经在积极地为开户投资者提供多元化的产品和服务。但是受制于“一人一户”制,券商的新产品,比如不同的基金产品、资管产品、新三板,只能向自己的开户客户销售,大大地限制了券商产品销售的市场空间。大家都是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来,可以说是类似于小农经济。所以一直以来,多数券商业务收入主要还是靠经纪业务佣金和投行保荐,综合金融服务收益占比不大,想发点产品也往往要和银行合作,时常沦为银行的马仔。

“一人多户”制度其实是打开了券商综合金融服务的通道,将为有能力提供有吸引力产品的券商,提供一个全国市场和数以亿计的客户群。可以预见,乘着A股高歌猛进的春风,券商提供自己优势产品、创新服务的积极性将大增,大券商固然可以为投资者提供全方位的产品和服务,小券商也可以靠自己的优势产品打天下。融资融券、股权质押、约定式购回、收益权互换、新三板做市、并购基金、直接投资、个股期权、股指期货等资本市场和衍生品业务,以及定增等“擦边球”产品,将越来越多地成为券商卖给广大投资者的菜(当然目前信用账户仍然只允许一人一户)。券商将逐渐摆脱作为银行“二传手”的角色,成为真正的、独立的、专业的资本市场产品服务商。这对于券商而言是一个全新的生态系统,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对于资本市场而言也

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转折点。

当产品线丰富起来后,券商作为投资顾问的作用也将重要起来。专业细分的投资顾问和全产品线的投资顾问业务,将是券商作为资本市场专业机构的核心环节。这将相应地增强客户黏度、推动资本市场投资的专业化。未来的竞争将在专业性的质量方面展开,而不是仅仅依靠通道和低价竞争获得客户和收入。在这样的压力下,中国的券商才能走向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因为它们有着天然的国际竞争优势;掌握着世界最饥渴而茫然的庞大投资群体,和一个体量巨大而尚待开垦的资本市场。

在此基础上,“中国大妈”们就不必自己去和国际大咖们PK了。同时,“一人多户”很有可能的一个副产品是,数量巨大的散户投资者越来越多地接受券商投资顾问的服务,此举可能会逐渐产生出一个半专业投资人群体,他们将接受妈妈侄子同学老乡战友同事等的委托,根据不同的专户进行资本市场投资,并且以此为生。

“一人多户”制度只是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制度,除了在信息技术上管理方便以外,主要还是由于资本市场投资品和差异化竞争的相对匮乏。据悉,香港市场开户是比较自由的,香港投资者不仅可以在多间证券公司开户,也可以在多间银行开立证券账户。新的“一人多户”制度,看似微不足道,但会促进投资者的需求得到更好的满足,一些新的需求将被挖掘,券商的综合金融服务将呈现百花齐放。投资将成为一个全民的生意,而不是一种起起伏伏时断时续的投机。

正如上面所说,此举可能会催生一个庞大的投资群体,继而形成一个投资文化。同时,它还可能给中国的企业的创业之火“浇上利益之油”。2015年中国“两会”上,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造成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前行的“双引擎”之一。全民投资热潮将有效地推动全民创业。同时,也要看到金融投资的风险性和逐利文化、投机文化对中国的改变。

## 亚开行行长:亚投行象征意义更大

亚洲开发银行日籍行长中尾武彦给中国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亚投行)的计划泼了一盆冷水,他表示,亚投行还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在资金规模和潜在影响力方面与亚开行比肩。最近几周,中尾武彦与其他开发银行行长一道,欢迎亚投行的设立并提出与之展开项目合作。多位日本财务省官员均执掌过亚开行,中尾武彦是最近的一位。

当下,全球基础设施投资严重短缺已成共识,人们在公开场合广泛认为,应欢迎所有

的新资金来源。然而,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中尾武彦强调,亚投行初期贷款能力可能相对较弱,此外,通过中国国开行等银行,中国已是全球基础设施融资领域的一个主要参与者。“我并不是要贬低该倡议。”他表示,“我认为这(成立亚投行)是可以理解的。”但他表示,亚开行目前在亚洲的贷款达到近1000亿美元,是亚投行初始资本金的两倍。而亚开行目前的注册资本总规模也已经超过1500亿美元。

他表示:“这是一笔巨大的资金。我并不

是在夸耀我们(亚开行)规模更大。但我们是有历史的,而且具备一定的贷款能力,还有专业技能,员工背景也多样化。我们能够继续发挥作用。”“我认为,全球开发融资领域不会(因为亚投行的创建)而发生重变化,不过可能会出现有关其象征意义的解读。”

中尾武彦表示,很多欧洲政府加入亚投行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总的来说,它们几乎没有对亚太地区有过历史承诺,尤其是与亚开行两个最大股东相比。

到目前为止,美国和日本一直拒绝成为

亚投行创始成员国,不过英国和法国等其他西方主要经济体以及印度等其他亚洲竞争对手都已加入。美国和日本对亚投行公开提出质疑,强调亚投行需要设立环境和社会标准或保护措施,以符合亚开行与世界银行(World Bank)等机构现在实行的标准。

亚投行距离真正设立并开始发放贷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各方必须商讨一份行为章程,同时,有关如何分割股权以及如何做出决策等治理问题也亟待解决。

尽管现在已有50多个国家申请成为亚



## 委内瑞拉总统宣布获得中方新贷款

处境艰难的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近日宣布,委内瑞拉已获得来自中国的50亿美元新贷款。

“通过与中国合作,我们刚刚获得50亿美元开发融资,还有50亿美元刚刚到位。”马杜罗表示,“我们正致力于其他批次贷款,如果这些贷款到位,我们会公布。”

中国是委内瑞拉最大的债权国。2007年以来,中国国有机构已向委内瑞拉发放逾500亿美元的贷款,据信其中约200亿美元尚未偿还。这些贷款很大一部分是以石油输出的方式偿还。分析人士表示,在今年1月访华后,马杜罗从中国得到的是对现有的200亿美元长期投资贷款的重组。

一个月前,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的一位高管告诉路透(Reuters)中国将向委内瑞拉贷款约100亿美元。首批贷款(50亿美元)将在4月发放。如果日前宣布的贷款确实是新贷款而且已发放,这可能会给马杜罗带来一些喘息空间。

预计委内瑞拉经济今年将收缩7%,该国正艰难应对油价下跌的影响。加拉加斯的经济学家表示,预计委内瑞拉通胀将超过150%,同时该国还要继续应对基本商品普遍短缺的问题。

(FT 中文网)



投行创始成员国,但该银行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中国计划,中尾武彦抓住了这点。他表示,亚开行是1966年在泰国的一次会议上创建的,但它是“很多国家”经过多年“非常广泛的讨论”的结果,“并不是只由日本创建。”

(FT 中文网)